



首爾作為韓國的首都，保存了多座朝鮮王朝時期的皇宮，包括景福宮、昌德宮、昌慶宮、慶熙宮以及德壽宮。這些宮殿各自承載着不同的歷史功能與政治象徵。筆者與太太最近到韓國旅遊，在多個選項之中，我們最終選擇了參觀德壽宮。這並非規模最大、也非保存最完整的宮殿，但它卻擁有一個極為鮮明而獨特的特色：在

傳統韓式宮殿群之中，竟然矗立着一座完全西式的新古典主義建築，那就是石造殿。

石造殿是一座以花崗岩與磚石為主要材料的西式宮殿，外觀與歐洲十九世紀的國家建築極為相似，線條對稱、立面嚴整，充滿理性與秩序感。這座建築誕生於大韓帝國時期，1897年，朝鮮末代君主高宗正式稱帝，並宣布德壽宮為皇宮主體，試圖以「大韓帝國」之名，擺脫長期以來在東亞宗藩體系中的從屬地位。石造殿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建，它原本計劃作為皇室的主要現代化居所與國賓接待空間，象徵大韓帝國邁向現代主權國家的決心。

然而，歷史並未給予這個計劃實現的機會。石造殿於1910年前後完工，而同一年，日本正式吞併朝鮮半島，殖民統治隨之展開，大韓帝國滅亡，皇室被迫退出政治舞台，石造殿亦從未真正成為皇室的生活空間。時至今日，石造殿成為大韓帝國歷史博物館的一部分，而其旁後來加建的西翼，則由國立現代美術館德壽宮分館使用。

筆者與太太參加了石造殿的導賞團，花了大約一小時逐一參觀建築內的房間與展廳。若單純從美學角度而言，石造殿並非特別出眾，它不如歐洲宮殿那樣華麗，未能帶來強烈的視覺震撼。然而，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，是它所承載的文化意義。石造殿所展示的，是大韓帝國皇室對西方文化與現代性高度開放、甚至主動擁抱的態度。這種態度，在當時的東亞世界，其實並不常見。

同一時期，亞洲多個國家同樣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。中國在晚清時期推行洋務運動，引進西方的軍事技術、工業設備與科學知識，試圖「自強求富」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儘管清廷在技術層面大量學習西方，卻始終沒有興建像石造殿那樣的西式建築，作為皇帝的正式住所或國賓接待空間。原因並不難理解：皇室



本身就是國家與文明的象徵，若皇帝居住在西式宮殿之中，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下，幾乎等同於公開背離自身的文化傳統與身份認同。打個不太嚴肅卻貼切的比方，這就好像微軟公司的最高管理層，全面改用蘋果的麥金塔作業系統一樣，在象徵層面上極具顛覆性。

那麼，晚清中國是否完全沒有西式建築呢？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北京東交民巷一帶，聚集了英、法、德、美等國的使館建築；北京南堂、同文館等宗教與教育機構，也大量採用西方建築風格。然而，這些空間無一例外都位於皇權核心之外，它們是外交、宗教或技術交流的場所，而不是皇帝的生活空間，更不是王朝正統的象徵中心。清廷對西方的態度，始終是工具性的學習，而非制度與象徵層面的轉化。

相較之下，大韓帝國末代皇室的選擇顯得截然不同。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朝鮮半島，已成為列強角力的地緣政治焦點，同時承受來自中國、日本、俄羅斯以及西方列強的多重壓力。為了求生存，高宗與其政治菁英試圖徹底擺脫傳統中韓宗藩體系，轉而以「現代國家」的姿態融入國際秩序。在這樣的脈絡下，對西方制度、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全面接納，成為一種務實而急迫的選擇。石造殿本身，正是一個明確的政治宣言：大韓帝國宣示自己擁有現代化的宮廷形式，能夠與西方列強在象徵層面上平起平坐。這種態度，與清朝「祖宗之法不可廢」的保守立場形成鮮明對比。清朝寧可在傳統中走向衰亡，而大韓帝國則在生存壓力下，寧願承擔背離傳統的風險。

韓國社會對外來文化的相對開放，其實並不只體現在建築或政治制度上，也深刻反映於宗教結構之中。傳統上，韓國長期受到佛教與儒家思想的影響，但到了近現代，基督教在韓國迅速擴展，如今基督徒人口比例已高達約三分之一，遠高於日本（少於2%）、中國（3-5%）、香港（14%）或新加坡（19%）等其他東亞社會。學界對此提出過多種解釋，例如基督教在日本殖民時期提供了精神支柱，在冷戰格局下對抗北韓威脅，或在威權統治年代成為公民社會的道德資源。然而，這些解釋仍未完全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：若

只是尋求心靈慰藉或倫理資源，為何不回歸本土的佛教和儒家傳統？或許，答案正如石造殿所揭示的那樣，韓國社會在歷史關鍵時刻，往往展現出一種高度務實的文化取向，不拘泥於傳統的形式，而是選擇當下最有助於生存與發展的方案。

回望德壽宮中的石造殿，它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建築本身是否宏偉，而在於它所凝固的一個歷史瞬間。在那個瞬間，大韓帝國試圖以現代性回應危機，用西式宮殿宣告自己的世界定位。即使這個嘗試最終未能改寫命運，石造殿依然提醒後人：建築不只是空間，更是文化選擇的具體呈現。

2025年12月14日

原載於南加州版《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